

---

# 浙江解放思想的历程及特点分析

卓勇良

**【摘要】**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省区之一,其解放思想的历程对于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本文剖析了浙江省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进而提出了“解放思想是渐进式改革的关键环节”、“解放思想的重大焦点是如何突破姓资姓社束缚”、“解放思想需要从当地发展的实际出发有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张扬地方个性是基层解放思想的实质”等观点,进而指出:当前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仍然需要解放思想。

**【关键词】**浙江; 解放思想; 改革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092(2010)05- 0097- 06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解放思想的焦点是姓资姓社问题。时至今日,姓资姓社问题依然时隐时现。当前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主流理论适应客观实际变化,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 一、解放思想是渐进式改革的关键环节

从形式逻辑角度而言,解放思想只是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只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及其客观情况的产物。因此,总体上来说,思想不可能超越物质生产水平,不可能超越发展阶段。如果一定认为解放思想是常态,那就是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思想应该超越物质生产条件,那就滑到唯心主义那边去了。

所以说,当必须强调解放思想,亦即非解放思想不能解决重大经济社会矛盾的时候,应该是出现了观念形式的东西,与物质生产条件不相适应的状况。也就是出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相适应的问题,这才需要大声疾呼地强调解放思想,否则就没有必要。

反过来就可以说,既然需要解放思想,就说明我们当前的方针政策,出现了束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些问题。而且,既然是上面大声疾呼解放思想,这说明上面是觉察到了这些问题。然而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面不是直接调整方针政策,而是要求通过解放思想这样的做法,来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变革呢?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大策略,这就是避免争论,“放”“活”结合的策略。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政府层面,对于生产力发展,主要就是“放”。放松农业管制,直至取消人民公社;放松计划管制、直至取消指令性计划;放松价格管制,直至取消政府定价。

至于放了以后应该怎么干,起先上面并没有明确提出,而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甚至在一些时候和一些局部,仍十分强调计划的决定性作用。正因如此,才需要大声疾呼“解放思想”,以达到摸着石头过河的目的。

当然,既然是“放”,就必然是“活”;既然是“放”“活”结合,就必然出现民间自主创业、自主选择生产关系,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的改革发展局面。

---

**作者简介:**卓勇良,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研究员。

---

所以说,解放思想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早期,解放思想的实质是解放民间生产力,就是通过基层和民间的行为突破,通过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上层建筑变革,推动经济社会的根本性转型。

这一过程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中央政府不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来推进社会变革,避免了社会动荡,从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社会高度稳定。

## 二、姓资姓社成为解放思想的焦点

当制度束缚弱化乃至消失的时候,发展生产力主要还是一种微观经济行为。对于民间来说,需要用最简单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可以说是以最低的交易成本,来最有效率的地从事生产经营。个人直接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自主决定分配,亦即个体私营经济,是一种最简单、最低化交易成本的生产关系。形成这种生产关系并不是哪个聪明人的刻意谋划,而是社会自然法则使然,是在制度束缚弱化的环境下,“自然而然”形成的。但也正因如此,个体私营经济姓资姓社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

综观 1955 至 1976 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路线,在把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看作万恶不赦渊藪的思想影响下,这条路线的一个核心是“去资本主义化”。基本过程大致于 1956 年完成,这就是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5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去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大行动。1954 年春农业合作化开始加速,1955 年春中共中央采取反冒进做法,不久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到 1955 年底全国合作社增加到 190 万个,土地由农民个人占有逐渐转变为集体所有。1954 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1975 年通过的《宪法》则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民已不再直接占有土地,1982 年通过的《宪法》继续保持这一规定。

1956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去资本主义化”的另一个重大行动。短短数年,对资改造加速升温。中共浙江省委 1954 年提出“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1955 年上半年主要是巩固与提高,当年 10 月份则提出在 1957 年完成对资改造。1956 年 1 月 16 日,受北京市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影响,中共浙江省委紧急召开会议,提出抓紧实施的要求,杭州、宁波、温州等七市分别在 4 天之内全部实现了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对于上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重大行动,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除了承认合作化有“缺点和偏差”、“过于简单划一”,“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适当”外,充分肯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了解了这段长时间的“去资本主义化”过程,就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会出现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持续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思维定式,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恐惧,抑制了正常的理性思维。姓资姓社争论是历史必然,并不是哪些个人天生就不赞成改革开放、天生就反对个体私营。

“姓资论”者具有很足的底气,因为他们能够在政策文件和经典文献,以及在历史进程中找到依据。“姓社论”者则比较苍白,只能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来进行反驳。所以如果不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本身的重大缺陷、以及全球性的知识溢出等原因,导致个体私营经济具有特别好的经济效益,并由此较快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恐怕“姓社论”不一定能战胜“姓资论”。

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这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解放思想问题,而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胜出的问题。不是思想胜利了,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胜利了。

### 三、浙江解放思想的重大焦点是如何突破姓资姓社束缚

浙江解放思想进程,是在全国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两个“凡是”情况下展开的。这是全国解放思想的共同特征,浙江也不例外。这两个方面均只能自上而下进行,因为对于地方党委政府和民间来说,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主动权的。

然而,解放思想必须有实践作为支撑,必须有行动作为载体,否则就毫无意义,而行动和实践的主体则主要是基层和群众。这是由于解放思想的大环境形成后,实际工作中仍较多地存在着思想障碍和束缚,解放思想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行动突破之上,这就形成了浙江解放思想的两条主线,其中如何突破姓资姓社束缚是一个重大焦点。

第一条主线是在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前,以突破姓资姓社束缚为主,积极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条主线是在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来,以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束缚为主,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路子。

前一条主线,事关经济制度变迁、行为主体确立、资源配置机制形成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说,前一条主线,更多地是涉及意识形态,地方党委和政府缺少主动权;后一条主线,事关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重大问题,更多地涉及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在姓资姓社问题取得重大突破以后,地方党委政府在这方面的主动权相对较大。

前一条主线是纲,后一条主线是目,相互间形成了纲举目张的互动关系。只有在经济主体具有较强活力,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基础之后,才能在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程。反过来说,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还必须落到发展战略、发展方式等方面,才能转化为发展上的巨大进步。当然,这也导致了解放思想的复杂性,即任何一个单项的解放思想进程,其收效都将是有限的。因此,解放思想的一个重大要求,就是必须具有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联动推进。

那么当前是不是就不再存在姓资姓社阴影呢?恐怕还不能这么说。至少从2005年底、2006年初,反对改革开放思潮的甚嚣尘上中,就可以得到证明。

### 四、浙江解放思想具体行动由紧跟中央到创造性发展的根本性变化

对于地方而言,解放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如何从当地实际出发,加快当地发展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再加“左”的影响,只能是时时处处紧跟中央;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行为空间较小,也难以体现浙江个性。

而在市场经济时期,只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真正落实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这就注定了浙江必须在若干具体行动上与中央政府的规定有所差别。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大幅领先以后,行为空间大幅增加,浙江就必须更充分地张扬其独特个性,否则就会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就在具体行动上,形成了对于中央政府具体方针政策的较大差异。如果在这些过程中不能解放思想,显然将大大束缚浙江的手脚。

#### 1. 改革开放前紧跟中央

这一时期的行为特点,是在各个方面都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然而由于中央方针政策出现了重大偏差,导致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

中共浙江省委1957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对于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主张。大会工作报告指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党的八大精神。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

---

一个地方党委居然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政治主张,肯定有不同寻常的背景。8天后,也就是1957年12月17日,毛泽东批示,要中办请有关领导同志看浙江的报告,并要求在当天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历史进程表明,发轫于浙江的这个主要矛盾的提法,成为日后大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起到了非常不好的负面作用。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浙江不断改变计划以紧跟中央,以至于当时嘉兴地委致电省委,抱怨怎么调整也跟不上省委的变化。“反右”中,浙江有三位副省级干部被打成右派,是各省之最。浙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1966-1976年,浙江GDP年均增长速度仅4.0%,比全国低1.2个百分点。

## 2. 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响应中央

这一时期的行为特点,是中央要求在先,浙江贯彻在后。以现在的眼光看,文革前的紧跟中央,至少从事后效果看,应该说并未完全体现浙江实际,而改革开放初期的积极响应,则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因而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1979年5月,省委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加快发展轻纺工业的要求,提出要“加快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时浙江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轻纺工业,而这是中央文件所不明确的。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形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奠定了日后推进产权改革的微观基础;积极发展轻纺工业有利于推动大众创业创新,奠定了浙江快速发展的产业基础。乡镇企业加轻纺,是浙江前二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两个基本法宝。

就在1979年8月,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就发展城镇街道企事业问题向浙江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主张。当时目的是解决大批知青返城后的就业问题,是响应中央要求而提出来的。不过浙江在实践中更为大胆,更为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通过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了允许个体经营的规定。

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年,省委坚持解放思想,引领发展。当时省委明确提出“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系统批驳了若干错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对于若干重大思想问题的正确见解。这一“搞活经济必先搞活思想”的重要观点,《浙江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具有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

## 3. 近10余年来若干具体做法逐渐与中央有所区别

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的行为特点,在既无中央有关提法,也无兄弟省市实践情况下,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形成了一系列“率先”,逐渐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形成了与中央的明显区别。

浙江在上有压力,下有指责情况下,长期坚持省财政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51号文件,提出实行市领导县体制,浙江仍实行省财政直接对县做法。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实施宏观体制改革,上面要求浙江把财政管理权下放到市里,地级市指责省管县做法不利于中心城市发展。省里不为所动,且进一步以没有文字记录、口头布置方式,开始实行“两挂两包”,进一步完善省对县的财政关系。

浙江在全国首次提出“城市化”战略。1998年12月,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而在中央这边,一直到2000年10月,才在中共“十五大建议”中,提出“逐步推进城镇化”。到2002年11月,中央才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浙江在发展城市化方面,与中央形成了明显区别。

另外,就在推进城市化的同一年,浙江提出了效益农业的发展战略,“什么来钱种什么”。浙江在2003年提出的“八八战略”,是一个全面、均衡的战略提法,包含着统筹、协调等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 4. 解放思想越来越具有广泛共识

浙江的新提法、新思路和新战略,在改革开放早期,有时不免引起争论,具有较多不同意见,有的甚至难以出台。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浙江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重大的突破性举措,越来越易为广大干部群众接受。

有两个案例,典型反映了这一变化。这就是外向型战略的被删去,以及城市化战略的一边倒。

1985年,浙江在研究发展战略中,提出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结果在征求意见时,省内有多数不同意见,也遭到了北京著名专家学者的委婉反对,省政府发布这一战略纲要时,虽然保留了其中的主要精神,但却没有出现“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一提法。而到了1998年,省委提出实施城市化战略,尽管当时中央和兄弟省份都没有类似提法,甚至据说高层也没有明确表态,却迎来了一片叫好声,且受到在京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外向型战略提法被删去,是因为浙江当时提出这一战略思想,超越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浙江1985年外贸出口只有9.4亿美元,2008年是1542.9亿美元。当时多数人认为浙江主要还是应该发展国内贸易,难以接受外向型战略。而当1998年提出城市化战略时,大家已深刻认识到,城市化水平较低已严重影响浙江现代化进程。这显然也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解放思想将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 五、基层解放思想的三个重要特点

#### (一) 回归传统是基层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开放前27年“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决定了最初的解放思想,主要是在当地历史传统中寻找改革发展之道。

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村尚处于以小农为主的状态,城市仅有少数现代机构及工矿企业,全省基础设施极其落后。在这样一个时点,关键是从习俗和传统出发,采取人民群众所习惯遵循、自然而然的一系列做法,来发展经济,而决不是追求什么“一大二公”乃至纯而又纯的所谓社会主义。

所以说,回归传统是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出发点。什么是传统,就一定意义讲,传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长期遵循的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虽然传统会出现不适应新形势的问题,但传统之能够存在和发挥影响,就表明相当一部分传统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因此当现行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难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时,其中的一个较佳选择就是回归传统。就农村而言,在经营主体上回到以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状态,在经营内容上回到历史传统的多种经营;就城市而言,重塑厂长经理权威;就整个社会而言,回归民间家庭和个人的自主创业。进一步就发展战略而言,就是回归轻纺优先的传统发展路子。

在当时环境下,只有回归传统,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创业创新积极性,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摆脱贫困,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优越性。义乌人选择了“鸡毛换糖”,绍兴人选择了“三缸”(酒缸、酱缸和染缸),永康人选择了小五金。这些回归传统的做法,很快改变了当地面貌。

#### (二) 强化上下理性博弈是基层解放思想的基本方面

中央从全局出发实施方针政策,地方从实际出发形成具体举措。无论在何种状况下,都会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长期来对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批评较多,这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中央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总是会有那么多的“下有对策”。当多数地方出现“下有对策”的时候,中央就应该反思自己,因

---

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中央的政策存在问题。因此通过这种反思,一方面是使中央的政策更适合地方,使得地方有较高积极性来实施这些政策;另一方面是让政策更加全面科学,使得地方没有空子可钻,提高中央政府的治理水平。

地方需要研究的是,如何使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实施中更适合当地实际。这就需要突破各种条条框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当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与中央有关要求出现矛盾的时候,就应该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尽量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来进行科学处理。

换言之,基层解放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在遵循科学发展观前提下,在中央大政方针框架内,与上面某些不切合当地实际的具体政策“对着干”,在上面没有做出具体规定的领域大胆地干,在其他地区还没有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下创造性地干。如果都是不顾实际地“顺着干”,都是循规蹈矩,哪还需要解放思想。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应该善于通过行动层面的解放思想,打破“上面等下面的实践,下面等上面的精神”的胶着。当今中国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中央出于平均数治理的要求,不可能所有的政策都符合所有地方的实际。如果老是等上面的精神,势必延误发展机遇。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看,一些具体领域的改革发展僵局,主要是通过地方探索和实践打破的。

中央则应善于总结地方实践,把地方在行动层面解放思想的具体举措,化为自身的解放思想,及时转变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从而形成解放思想的制度化进程。

### (三) 张扬地方个性是基层解放思想的实质

浙江解放思想进程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张扬区域发展个性。中央政府按照全国平均水平来治理这个国家,当浙江发展水平居于这一平均水平以下时,不可能过多地领先这一平均数来实施一些具体举措。当然,由于每一个省份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因此即使低于平均数,区域发展路子仍应有所区别。然而普遍低水平将压抑区域个性,导致各地初始发展无差别或差别不大。

而到了上个世纪末期以后,浙江人均 GDP 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 1.67 倍,这显然就要求浙江的工作,必须大大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才行。正是在这种相对较高生产力的推动下,浙江的一些工作,才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特点。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浙江人均 GDP 高于全国的倍数,2004 年以来出现了停滞仍至下降,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浙江解放思想进程将有所放慢呢?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也形成一个重大判断,就是基层解放思想的一个实际效果,就是要形成地方具体举措与中央一般要求的区别,从而形成切合当地实际的改革发展路子。

## 六、当前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

当前我们已经一定程度地解决了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但至今仍没有较好解决上层建筑不适应变化了的生产关系、主流理论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等问题。在这些方面,如果仍以基层和民间的行为突破为主,则将步履艰难,甚至严重影响民间生产力发展,迫切需要推进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若干重大政治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显然是当前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有人会说,合作化和对资改造,是在当时特定时期实施的,应该历史地去看。然而毛泽东 1940 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还提出,“这个共和国将采

---

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 …,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刘少奇所作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对资改造“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这些都表明,我党曾充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将需要一个较长时期。当时如果真的历史地来看,很可能并不会出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状况。

科学确立民营经济应有地位,就是由此而生的重大问题。虽然已经很少有人否认民营经济的积极作用,但其实际地位仍较低。类似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这样的提法,让人顿生很多疑窦。需要控制什么?无非就是民营经济不可信,不可靠,关键时刻、关键领域还得靠国有经济来控制民营经济。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民营企业家们会作何感想,对他们的企业发展和投资决策,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切实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治理关系,将有利于沿海发达地区的进一步较快平稳发展。浙江 2008 年人均 GDP 是全国平均的 1.86 倍,全国有 18 个省份的人均 GDP 仅为浙江的 1/2 以下。这就表明,中央政府不能像治理中国多数省份那样,来实施对于浙江的治理,而应该采取高度差异性的政策,否则就将大大束缚浙江手脚。在这方面如何解放思想,如何采取积极举措,显然也是一个重大课题。

当前,浙江经济发展进入相对低增长阶段,亦即相对于全国而言,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经济潮起潮落难以避免,是客观规律在起着作用,浙江当前经济增长相对速度低一些,也不是什么坏事。然而对于党委和政府实施区域治理来说,经济潮起的时候,重在健康稳定;经济潮落的时候,则应重在减少其不利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解放思想,特别需要党委政府推出开拓创新的重大举措。